

新谍报学

〔美〕迈尔斯·科普兰著

郭纪晴译



群众出版社

186

新 谍 报 学

——不用斗篷，也不用匕首

(美) 迈尔斯·科普兰著

郭 纪 晴 译

D526
8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WITHOUT CLOAK OR DAGGER
The Truth
ABOUT THE NEW ESPIONAGE

by
Miles Copeland

根据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版翻译

学 报 新 谍

——不用斗篷，也不用匕首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15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1.20 元

作者序

在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原美国陆军反间谍队的军官们讲起了伯尼·费德曼少校的故事，内容是德国审讯员怎样终于从他的嘴里了解到了真实情况。费德曼是反间谍队的一个高级教官，在一次战地值勤中离德军防线太近而被俘。

费德曼的审讯者用尽了各种方法：严刑拷打、心理压力、耍弄诡计、给以厚遇（在德国情报官员俱乐部里享有全部特权，在所谓“英语桌”上占有一席），但他们仍然未能使他漏出一点情况：不管是关于他的指挥部，或者是关于他最拿手的问题——“情报员无线电网的管理”。有一个德国审讯员在战后受审时对我们说：费德曼大概愿意我们折腾他，这样可以给他机会成为英雄。

但是德国人最终还是打中了他的弱点。他们把他送到德国一所培养领导间谍的干部学校里去，把他配属给一个教官。此人自以为在搞情报网的问题上比费德曼要懂得多。费德曼每天都得坐在他身旁听课，听他带着日耳曼式的自信向学员们演讲错误的东西。有一天，费德曼实在忍无可忍，情不自禁地顶撞了德国人一通。他谈了美英情报机关怎样搞情报员通讯网的情况，还向德国人提了一些应该怎样搞通讯网的建议。

上面这个故事大概是不足信的，虽然这个德国教官（现

在任斯图加特某农药厂的一位高级经理人员），几年前，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一个第二次大战反间谍队军官团聚会上发表演讲，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故事是真的。但是我必须讲，我要是处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也会说真话的。当我见到在电视里、广播中和银幕上以及书里、杂志文章里和新闻报道里充斥着关于间谍、反间谍的错误描述时，我明白了费德曼当时的感受。关于这个我绝大部分职业生涯所从事的课题，我也非常强烈地想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

请这样来看问题：中央情报局的“肮脏勾当部”——在中央情报局里是比较小的单位，主管间谍、反间谍和颠覆、反颠覆行动，在世界上每个重要城市都有办事处和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工干部”，他们得到当地官方的配合。他们的“行动”从这些重要城市开始，越过国界，进入邻近的地区。这些地区或者是与美国为敌，或者是因某种原因仍是我们及世界和平的祸害。除非你能相信即使象我们自己这样一个挥霍和低能的政府，会容忍一个庞大而费钱、但又无所事事和不见成效的机构的存在，那你才必定相信它总会做成点事情。更进一步说，你才必定相信它所做的事绝大部分是成功的。任何一个政府，即使我们自己的政府，也不会长期容忍一个开支巨大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机构。

但总的说来，引起人们注意的正是它的失败。我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些年里，据人们所知，苏联仅仅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我方情报员。即使有可能苏联人实际上发现了比这多上十倍的情报员，不宣泄他们已被抓获，而把他们变成了“双重间谍”，这种失败率也是低的。在那些年里，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红色中国、古巴和其他共产国家有上千的情报

员。只损失了一个（那怕十个、一百个），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纪录。

当然，大多数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是由于同间谍或反间谍无关的隐蔽行动被揭露而引起的，如：猪湾之灾，企图贿赂马来亚总理，相当公开地推翻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以及在老挝的“中央情报局秘密部队”——实在是历史上最不秘密的秘密部队。所有这些行动，实际上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方式大相径庭。拿猪湾行动来说，开始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顾中央情报局关于难以成功的预测而下令搞的。然后他的继任人肯尼迪总统来个釜底抽薪，在最后关头不给行动部队以空中掩护；而从策划者看来，这种掩护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中央情报局的非谍报“秘密行动”（这是专指间谍和反间谍以外的一切秘密行动的不准确用语）总是成功的。在某个国家的选举中，苏联克格勃支持一个候选人，中央情报局支持另一个候选人，获胜的是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人。或者是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帮政治家或军人，推翻了一个克格勃支持的政府。或者是一个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府，防止了一个克格勃支持的政府对它搞的一次政变企图。这类事情经常发生。

现在需要提出根据来证明，为什么我就能够进行公正而准确的叙述呢？打开始说起，我是原来美国秘密情报组织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反间谍专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审讯德国反间谍人员，来确定我们英美的间谍中谁被他们抓住杀掉了，又有谁背叛了。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美国情报机关”懂得了在经营谍报工作时什么是可以干的，什么是不可以干的。我把这些知识介绍给新成立的中央

情报局，帮助设计征募情报员的程序和技术，并使之条理化，形成有效的情报系统。自那以后，我多次被召回到局里去，根据局里的高级反间谍专家发现的“另一方”偶而成功的渗透，来检查这个系统并提出改进意见。同时，在中央情报局知情并至少是默许下，我曾协助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组织情报和反情报系统，并使它们开动起来。一句话，我对这一行动的了解是来自内部，并且很全面，使我得以不致犯那种离开中央情报局后去写揭露材料的那些专家们所犯的错误。

那么我是否有可能泄密以致使这些情报系统遭到危险呢？我特地给自己规定了以下限制：我绝不泄露能使“另一方”了解到某个英美现实活动线索的情报，或者能说明英美反谍机构已了解到“另一方”所搞的某些特定活动。我绝不透露任何菲尔比及其他类似的人没有告诉过苏联人的英美间谍技术或手段，或者是“另一方”并不了解英美方面已经发现了的外国技术或手段。而且除了某些例外，我把行动的细节和有关人员的真实姓名作了改换，这样读者对我据以描述的真情实况就只能猜测而已。

我必须说明，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并未审查批准出版此书，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同意我写此书。我和情报机关的长期交往使我认识到：象我这样的人来申请正式批准出版一本那怕是最干净的书，也完全是徒劳的。要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提交他的回忆录，某个可怜的保安人员就不得不坐下来逐字阅读，并且写出一份备忘录来解释他所要求作的每个删节。但我并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任何保安人员在我送审手稿时，只会对标题看上那么一眼，

想想他也许会漏掉那怕是一句话，而这句话很可能是爆炸性的，于是他就决定批驳出版。

因此，我是我自己的检查官。如果我在书中讲到了一些至今尚在严加保密的案件或情报的话，那是由于我不同意对它们继续加以保密。既然象菲尔比这样的人已经把这样的材料给了苏联人，我不认为有任何理由还要向美国公众保密。

目 录

作者序

第一章	七十年代的间谍·····	(1)
第二章	谍报活动——情报机关的最后手段·····	(20)
第三章	间谍赛·····	(66)
第四章	常规谍报活动·····	(101)
第五章	反间谍行动·····	(144)
第六章	第三世界行动·····	(180)
第七章	“特殊项目”·····	(209)
第八章	“公司”·····	(237)
第九章	结论·····	(262)
后 记	·····	(289)

第一章

七十年代的间谍

他们确实依然存在……

在拉姆顿—杰利科事件——两位英国贵族勾搭上了妓女的事情发生以后，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来调查英国政府的安全被危害的程度。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迪普洛克勋爵的领导下，集中力量调查这两位不幸的贵族中有没有谁在枕上泄露了重要机密——以及，他们中有一个人在与妓女交往中吸大麻叶一事对案情有无关系。他们只简单地论述了使用讹诈的可能，因为所有的委员都很清楚，这两位老爷虽然在这方面有错误，但都是诚实的好人，对任何讹诈者必定会报之以冷笑。

英国安全官员们对这一报告不提出异议无疑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但报告的天真直率想必会使他们感到震惊。一些间谍机关广泛利用妓女，或者“性酒吧间”、按摩室、陪同服侍、模特儿工作室以及所有其他的途径，并不是要从他们所选中的对象那里探取秘密。他们采用这些手法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对象陷入危险的处境，然后对他们使用讹诈。安全官员们深知，这两位贵族中不论哪一位，不管是吸大麻叶或者是喝酒，都没有把机密泄露给妓女的危险。你能想象拉姆顿手

里夹着香烟，说道：“亲爱的，我一定得告诉你关于新的 X 5—11”——或者即使说了，那个妓女对他所说的会有任何印象吗？危险不在于在“女人打动之下”随便乱说，而在于受到讹诈——不是指拉皮条的人威胁“不给我一千镑，我就把这些照片送到各报社去”这种讹诈，而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干部”使用的高级尖端方法。

在安下心来专心研究拉姆顿—杰利科事件的调查结果前，迪普洛克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是先研究现代间谍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为好。他们可以首先考虑克格勃是如何设法渗入我们两国政府的，然后考虑我们两家的间谍机构是怎样打入俄国和其他“那一边”国家的政府的。

让我们从“埃米莉”一案说起。“埃米莉”是一位诱人和腼腆的小姐，她在一九五〇年的一个春夜，与一位年约四十左右的和蔼漂亮的男子邂逅，我们叫他“福斯特”。

埃米莉是助理国务卿的私人助手。这位助理国务卿领导一个司，负责第三世界一个重要地区的工作。因此，她接触这个司的所有机密——就有关这一地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交换的意见；美国政府执行这些政策的意图；与第三世界这一地区的政府领导人的秘密协定；一旦可能发生意外事件时美国舰队的应变计划。福斯特是做“保险生意”的，对国际政治没有明显的兴趣。

埃米莉和福斯特第一次相遇是在华盛顿西北区第十六街上的一所唯一神教的教堂里为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举行的茶会上。那正好是埃米莉获悉有关她母亲的坏消息的同一天。埃米莉的母亲是一个八十岁的寡妇，爱发牢骚，喜欢无病呻吟。她刚刚得知她自己真正得了癌症。大夫断言

她已到了手术无法挽救的阶段，并预言她可以再活几年，然后痛苦地慢慢死去。

埃米莉与福斯特的初次会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那天晚上他把红葡萄酒溅在埃米莉的新衣服上，使已经心烦意乱的埃米莉哭了起来。福斯特深深地道歉，坚持要送她回到乔治城她的家里，等她换上家庭便服后，他可以把被酒溅脏了的衣服送到“一家我所认识的法国洗衣房去，他们可以去掉任何污迹。”听到埃米莉的母亲从卧室里的叫喊声（“埃米莉！埃米莉！”）后，福斯特很快地喝下了一杯夜酒，随后，他们在门口握了手，福斯特就此告辞。

他们的友谊开花了。正如埃米莉后来所承认的，这虽“够不上本世纪伟大的罗曼史”，但却“非常愉快和轻松”。

福斯特好象并不要求任何东西，连性方面亦无要求，对埃米莉的工作也不感兴趣。好象和埃米莉在一起就使他真正感到愉快。他熟悉各种舒适的小餐馆——在乔治城内；在马萨诸塞大街上；从华盛顿东南穿过马里兰州界，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聊天，可以互诉衷曲。他们一起去看戏、听音乐、看电影。福斯特显然并不富有，但他负担得起所有简单娱乐的费用。他对待埃米莉的手法使她完全不感到自己在被“培养”。福斯特常常“只是为了聊聊”而打电话给埃米莉，而埃米莉第一次给福斯特打电话时对方反应是如此地热情（“我正在想着你呢，”他说），从此她不再害羞，每当她感到寂寞时，她便打电话给他。

不到几个月，福斯特就诱使埃米莉在经济上依靠他了。开始数目是很小的，福斯特也不得不借口“这是为了你母亲”。他完全取得了这位老太太的欢心。以后数目增大了，

也更经常了。埃米莉不知不觉开始把这种馈赠作为她正常收入的一部分。整个这段时间，福斯特没有要求任何报答，除了偶然在楼梯上匆匆一吻之外——虽然他的举止表明他的感情并不是完全纯精神的。的确，对他来说，不这样做倒会显得不自然。

然后，有一天，福斯特请埃米莉帮他一个小忙。福斯特是在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在人口中占极大比例的城市里做保险生意的，当然很想“打进国务院市场”。一般都认为，那里都是些追名逐利的人，他们不仅领取极高的工资，还拥有大量的私人财产。“仅仅靠向你的朋友推销人寿保险，就能维持我的生活了，”福斯特这样对埃米莉说。于是他要她提供一份她在国务院的熟人的名单以及这些人的职务简况。

埃米莉开始不肯。她说国务院每年出版一本《工作人员名录》，一本《外交人员名册》以及其他类似的资料，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政府书店中很容易买到。但最后她让步了。福斯特解释说，他要的不是“《工作人员名录》中可以找到的资料”，而是那些能够说明那些职员是保险生意最好的对象以及什么是用在每个人身上最好的生意诱饵的个人情况。“我可以安排一次鸡尾酒会，让你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面，”埃米莉说。“不，还不到时候，”福斯特回答，“而且，目前我们还得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埃米莉不理解，为什么她能向福斯特提供的有关她朋友的材料会对他有任何真正帮助，为什么还要保密，但她还是照他的要求做了。不久，她就毫无约束地闲扯起她的同事们的情况，甚至谈到一些他们所从事的一些保密工作。偶然她也记起局里的保密教育，在告诉福斯特某件特别机密的情况

后，她会吃吃地笑道，“真的，我不应该告诉你这种事！你决不能把我告诉你的告诉任何人！”福斯特向她保证他不会这样做。

福斯特是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官员，他是在让埃米莉经历职业间谍训练者的行话所谓的“招募前的培养”。第一条规定是：“不要强求你的未来情报员去做任何超出他的良心允许他做的事。培养情报员过程中的第一个任务是逐步扩大其良心范围，使他最后能问心无愧地去做你要他做的事。”等到福斯特要求埃米莉在晚上把秘密文件带回家（供他拍照并在第二天早上上班时放回原处）的时候，她是乐意的。事实上，他知道她已经成了一名苏联的情报员了。

埃米莉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了十四年——没有出过事故。她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银行里积起了相当大的一笔存款，本来可以在几年后舒舒服服地告老退休。但是福斯特在她从事间谍工作不久便失踪了。一个聪明媚人、独立富裕的女人，虽已年过五十，总还有风流际遇的缘份。

就在埃米莉初次结识福斯特十四年后的一个春天的早上，一个苏联叛逃者在阿勒格尼山中央情报局的“人类图书馆”受审时，无意中供认：“你们在××问题上为我们编造的材料，我们是一清二楚的。”在审讯者的追逼下，他对“材料”作了某些具体描述。虽然 he 不能说明确凿的来源，他从内容中推断这是来自——或他想可能是来自——助理国务卿办公室，来源可能是他的私人助手。他说几年以后，苏联分析家得出结论：许多情报是假的。

随后，华盛顿出现了一次所谓的“慌乱”——或者，用更现代化的术语说，一次“沉着的慌乱”，因为情报机关在

怀疑有泄密情况时已不再采用其惯用的粗暴审查手段了。对这次泄密情况的调查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以免打草惊蛇。调查直接查到了埃米莉身上。埃米莉在她多年的朋友、国务院首席安全官员有礼貌的讯问下，承认了一切。

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长期深藏在国务院机密核心内部的苏联特务，天晓得她给苏联人提供了些什么情报。苏联人过去十四年来的行为，应根据我们现在已明白苏联人早已知道我们真实意图这一情况，重新作出解释。需要重新作出各种评价。损害也许还不太大，因为，如果苏联叛逃者的话是可信的，几年来苏联已认为埃米莉的情报是假的。那么只能作出一个有几分可靠的结论：公布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害处将大大超过审判埃米莉能得到的好处。简直无法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即使是最完善的保安系统也不能防止埃米莉这样的间谍渗入。所以，当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假情报”专家建议国务院利用苏联显然相信埃米莉一直是一个假特务的时候，国务院安全当局马上接受了这一意见。埃米莉被留在她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但在随后的几周内，她奉命向苏联人提供一些一看就是假造的材料，以便增加他们对过去所收到的一些真材料的怀疑。

最后，埃米莉逃脱了处分，免于受罚，只是将她在贝鲁特银行积存的十万美元大部分交给了美国政府。她被调到某个行政工作岗位上工作。这以后不久，根据安全部门的安排，她宣称得了一种神经方面的病，需要离开政府，寻求比较轻松的工作。现在她是新英格兰某个小城市的图书馆管理员。

“真正成功的间谍”

埃米莉是中央情报局“谍报活动管理”课的教官们在训练新官员时想要培养的间谍中的一种。他们在开始讲课时便提出，“首先，必须忘掉你所读到过的一切间谍案例。仅仅根据你们已经读到过的这一事实就已说明它们只是一些特殊的例子。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人们抓不住的、因此也是人们读不到的间谍事例。”

讲课中指出：大多数的间谍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常常是靠存在国外银行的收入，退休后过着舒服的生活。讲课中有这样一段从英国情报机关借用来的话：“一次成功的间谍活动有如一桩满意的婚姻，其中没有什么不平凡的地方。它是平静的，不会成为一个轰动的事例。”

给新官员们讲授非常能干的而不是那些被人识破的笨蛋的间谍案例，很自然地带来一些难以应付的问题。官员们既研究为“那一边”工作的间谍案例，这些间谍很有能力，但因意外事故而被捕；也研究“自己这边”的那些长期从事情报活动而未被发现的间谍的历史。后者学员们可以从阅读删节过的中央情报局活动记录中看到。然而，从阅读中央情报局的成功的间谍案例所能学到的东西是有限度的。由于他们都是外国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要新官员们同他们一样是很困难的。中央情报局的教官要他们的学生具有谍报活动以及当一个间谍的体验，因此在教材方面他们更愿意选用苏联间谍在美国人中间发展他们的间谍的事例。因为这些间谍是美

国公民，一般说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与这些学员是相似的。一旦学员们摸清这些人的动机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弱点和内心的忧虑，他们便可以进入更困难的阶段，即了解充当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共产党国家的公民。

中央情报局间谍学校的学生首先要学的是下述几类美国公民的间谍案例：

1. “埃米莉”式——这种间谍原已被克格勃的招募者（也是美国公民）看中，他或她的潜力受到赏识，然后象原来的埃米莉那样，按照管理情报员的例行原则加以考核，征募和训练。

2. “米基”式——这种“不招而来”的间谍，由于他们所特有的知识和经验，得以与某个外国情报机关进行接触并为之效劳而不被反间谍机关所发现。

3. “菲尔比”式——在青年时代即被发展，长期当间谍，但在被发展时还没有打进指定的目标，多少年以后才设法打了进去。

4. “威利”式——这种间谍实际上是为某个情报机关服务（例如：苏联间谍机关），但是他的“负责人”使他认为自己是在为（至少是部分地）另一个什么机关工作（如某个工业情报组织、信贷调查组织，或是某个报纸专栏作家）。

最恰当地反映这些类型的案件的是苏联打入西方国家的目标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与西方打入共产党方面的案例，或与其他国家的谍报部门打入别的国家的秘密机关的案例，只有很小的差别。